

# 傅莱：“活着的白求恩”献身中国65年

韩惜国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是一名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革命胜利后，他继续留在中国致力于医疗卫生事业，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



青年傅莱



傅莱为战士诊病

## 跨越：辗转万里寻八路，洋教员教学中文

1938年，日军集中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了残酷“扫荡”，根据地伤员激增，医务人员极为缺乏。正是在这一年，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名正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习的19岁犹太青年，因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遭到德国军警的迫害追杀，被迫离开家乡。这名青年毅然决定乘坐驶往东方的邮轮，去寻找中国的反法西斯革命队伍。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他来到了当时无须签证的中国上海，一边靠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寻找八路军的踪迹。3年后，他在天津结识了美国牧师胡本德，被其介绍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进而与八路军接上头。随后他几经辗转穿越层层封锁线，终于在1941年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见到了根据地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根据他的母语发音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并说：“你是追求自由找到八路军的，这个名字很好（‘傅莱’是德语‘自由’frei的谐音）。”从此，傅莱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开始了崭新的革命生涯。

为了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傅莱不仅远渡万里重洋，还要跨越语言的鸿沟。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他被安排在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学教学工作。为了能长期在中国工作，他婉言谢绝了聂荣臻给他配翻译人员的提议，硬要自己努力克服语言困难，学习用中文教学。他备课的方法是分三步走，第一步：用德文写好讲稿；第二步：借助字典查出讲稿上的字词，按照字典上中文字体的样式抄下来，再在每个汉字上注上发音；第三步：请周围的中国朋友编成句子教他练习。用这种方法，每上一个小时的课他都要花八九个小时备课。他讲课时还常常因为发音蹩脚引得学员捧腹大笑，但学员们很喜欢上他的课，因为讲得活泼有趣、通俗易懂。经过一年多度寝忘食地勤学苦练，傅莱终于能熟练地用中文交流与授课，还高兴地说自己已经开始用中文做梦了。

## 创造：窑洞里研制青霉素，中西医结合抗疫情

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傅莱积极投身科研，成为中国研制和使用粗制青霉素的第一人。青霉素是人类最早发现的抗生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发明之一。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傅莱得知青霉素已在英国用于临床，美

制青霉素也已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但是在中国一支难求、价贵如金，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青霉素研制出来。他以救济中国总会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请求帮助，不久后收到菌种和一些早期研究资料，可是这些资料中并不涉及青霉素的生产工艺。

1945年初，傅莱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自己动手打造了简陋的实验室，开始试制青霉菌素。为了创造22—26℃的菌群培养环境，他们利用窑洞的恒温性能外加烧火加热，自创“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以保证温度；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没有搅拌机和摇床，他们就穿着隔离服定时进入恒温间抱着发酵瓶振荡。就这样，经过50多次的失败，他们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批粗制青霉菌素，立即成为前线宝贵的外用药物，还有效治愈了肺炎、脑膜炎、淋病等疾病。傅莱积极向各解放区推广“土青霉素”生产工艺，呼吁尽快建造边区物产制造适宜的培养液，并培养相应的技术干部，以普及青霉素生产，解救更多生命。得知中国青霉素研发工作的巨大成功，马海德医生不禁感慨道：“如果白求恩大夫遭致命感染的手指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

傅莱还是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病的先行者。1942年9月，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开幕式，傅莱在大会上作了《疟疾、结核、疟疾的诊断与治疗》的学术报告，反响热烈，随后他成了晋察冀军区传染病教学和防治工作的带头人。

1943年，麻疹、疟疾等传染病在晋察冀边区大肆流行，部队因疫情造成的减员有时甚至超出了战斗减员。当时边区缺乏医药，奎宁等特效药尤其匮乏，疫情控制特别困难。为了战胜疫情，傅莱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的号召，虚心向当地老中医求教针灸古法，探索出用针灸结合西医疗法进行综合治疗法，并亲自深入作战部队进行试验和推广，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这一

贡献受到聂荣臻司令员以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赞扬。傅莱还撰文《灵药的危险》，指出磺胺类药物等抗生素的滥用会导致人体产生耐药性和免疫力下降，告诫人们要科学使用抗生素，为中西医结合弥补西医疗法有限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 信念：共产主义事业没有国界，为人民的健康幸福奋斗终身

傅莱原为奥地利共产党员，一来到抗日根据地，就提出想参加这里的党组织生活。但他被婉言告知，“由于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可能携带奥地利共产党的介绍信，按中共的规定，暂时还不能参加这里的党组织生活”。不过，中共八大以前的党章，没有明确把入党申请人的国籍作为基本条件，因此傅莱当时作为外国人也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傅莱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由于他工作表现突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44年11月，经聂荣臻介绍、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彭真亲笔起草函批准，傅莱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顾这段入党经历，他说：“我在八路军根据地找到一个同奥地利共产党一样为着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党。共产主义事业是没有国界的。”因此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和追随，坚信为中国人民工作也就是为奥地利人民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傅莱加入了中国国籍，先后担任西南军区卫生部负责人、重庆卫生部顾问等职，曾长期在西南山区致力于当地地方病和传染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为减少和消灭钩虫病做出突出成绩。

1979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和医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致力于中国国内医学情报信息网络的建设和1987年，在他的总策划、总调度下，中国引进美国相关技术，建成了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使中国的医药卫生工作者、教学和科研人员随时可以检索到全世界的生物医学文献。因此，他也成为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管理的开创者。作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

员，他积极参政议政，多次就加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基层医疗卫生建设、改善革命老区人民生活、改革国家医疗体制等问题建言献策。

当有人问傅莱，为什么不在战争结束后回国享受更舒适的生活，而要留在中国继续操劳时，他回答说：“我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马克思主义中就没有贪图享受这一条。”战争结束后，我本可以回奥地利继续深造，在回奥地利探亲时，那里的朋友也劝我留下。我知道，留在奥地利也许我会更富有，可是我到哪里去寻找在中国艰苦岁月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和友爱呢？”“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半途而废。”

2004年，傅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遵照其遗愿，遗体捐献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作研究之用，骨灰撒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位于河北唐县军城镇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与白求恩、柯棣华等昔日战友相伴。两年后，在维也纳傅莱的母校也竖立了傅莱纪念碑，由奥地利总统亲笔题写碑文。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将永远活在两国民众的心中。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5月17日报道傅莱试制青霉素成功

# 林徽因与小说

王吴军

林徽因是20世纪初期著名的才女，许多人都喜欢她写的诗，因此，人们常常把林徽因和诗联系在一起，其实，林徽因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她和小说也有着不解之缘……

1936年正值《大公报》创刊10周年，萧乾要编一本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小说选集，当时，萧乾觉得最合适的编选人是林徽因，于是，萧乾就把编选这本小说集的工作交给了林徽因。林徽因不负萧乾厚望，很快编出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一书，选入小说30篇。入选作者既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还选了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一篇小说，题目是《小还的悲哀》，当时这篇小说的作者署名是“叔文”。无论名家或非名家，这本小说所选的作品都堪称是上乘之作，包括张兆和的那篇小说，绝非因私人感情而滥竽充数。林徽因还为本小说选集写了两三千字的《题记》，阐述了她对小说的精辟见解。林徽因编选的本小说选集在当时很受读者欢迎，当年8月份初版，10月份再版。50多年后，上海书店又影印出版。

对于当时的小说作家，林徽因非常赏识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的名篇《边城》还未问世，林徽

因便看出他以后在小说创作上必会有不俗的成就。有一次，沈从文去京郊香山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林徽因，随身带着一本自己的小说作品，准备赠给另一位诗人，林徽因见到后，很想得到沈从文的这本小说作品，沈从文就在这本小说集的扉页写道：“与其送给诗人，不如送给诗一样的人。”然后，把这本小说集送给了林徽因。

北平解放，林徽因有机会接触到了赵树理的小说。当时，林徽因与赵树理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文字交往，但是，赵树理小说中的浓厚乡土气息，以及健康清新的生活风貌，使林徽因十分赞赏，她还从赵树理的小说中看出了沈从文的影响。

林徽因在诗歌创作伊始，就开始了小说创作。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说是1931年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窘》，写的是一个中年教授与一个同事的女儿虽能随意相处却不能随意相爱的种种窘态。这是林徽因尝试写小说的开始，谈不上有多深的思想内容，可是，她对教授微妙心理的细腻刻画和窘态举止的传神描

绘，足以显示出林徽因小说创作上的才华。1934年，林徽因发表了《九十九度中》这篇小说，以内容鲜明、技巧娴熟名噪当时的文坛。对于林徽因的这篇小说，评论家李健吾著文赞叹道：“奇怪的是，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利落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我所要问的是，她承受了多少现代英国小说的影响？”确实，林徽因的这篇小说把酷暑的北京街头形形色色披露细腻地描绘了出来，处处透露匠心，这是林徽因对小说的意识流创作手法非常成功的探索。

林徽因的小说多数是体现京派风格的作品，如《钟绿》《吉公》《文珍》《绣绣》这些系列小说，主人公都有生活原型，因而，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大主题，叫作《摄影零篇》。《摄影零篇》系列小说用叙事的笔调，追述逝去的人和事，文字淡淡的，却耐人咀嚼，读来感觉素雅、淡远、隽永。

林徽因对自己写的小说是充满自信的，她在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毫不避讳，将那一年她发表的两篇小说《钟绿》《吉公》都选了进去，在入选之作中，《钟绿》《吉公》都堪称上乘。后来，有人编了一本《京派小说选》，选取了林徽因的三四篇小说。

研究新月派诗歌，不可忽略林徽因。研究京派小说，也万万不可忽略林徽因。

##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 蔡元培与儿童节

郑学富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非常重视儿童教育，经常参加儿童节的活动。1934年4月4日上午10时，上海市政府举行儿童节庆祝仪式，蔡元培前往参加，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将儿童节命名为“双四节”，并作了独到而精彩的解释。他要求小朋友要牢记“八个字”，第一个四字，即“食、衣、住、行”。他解释说：这四个字“是我们的基本生活。现在仰给于家庭父母，如果没有父母的供给，或父母不注意，即发生危险。故各位要记着此时此刻父母供给，将来成人后即要努力工作，以抵偿今日之债”；第二个四字，即“智、体、德、美”。他解释说：“大人们锻炼你们的身体，培植你们读书，告诉你们做人的道理，陶养你们的性情，就是智体德美四种教育”。

蔡元培情系儿童节，更体现他对儿童家国情怀的教育与熏陶。1935年1月26日，他在中华慈幼协会六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幼年预备担当将来事业的，可代表将来”，“将来的世界，完全靠儿童们长大后的活动”。在家中，蔡元培时刻不忘对孩子们品德气节的养成教育。有一次，他在孩子们的画作上题字勉励孩子们。其中给蔡晔益题的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给蔡怀新的题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蔡英多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蔡晔益10岁生日时，蔡元培手书七律一首赠

给她：

生男生女无悲喜，不要轻分瓦与璋。  
学级高低同及格，公民选举共登场。

望儿再历十年后，应世能名一技长。  
今日书非必要，练身第一要康强。

蔡元培一生清廉简朴，不求奢华，平时生活俭朴，穿着随便。孩子们的穿着也与一般平民子弟无异。父亲的人格力量，陶冶了孩子们的情操，甚至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1938年4月4日，移居香港的蔡元培与儿辈一起欢度儿童节。几位好友携子女们也前来参加。蔡元培郑重其事地致开会词、闭幕词，来宾也分别演说。孩子们载歌载舞，画画写字，相互赠送礼物。蔡元培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他还给小儿子蔡怀新赋七律一首：

九龄自视已斐然，初度回看已巳年。

采里良苗高士句，兰亭秀竹暮春天。

即今书画随慈母，他日行能企大贤。

得似儿童佳节否，嘉宾多许赠名言。

1939年4月4日，蔡元培创作了《儿童节歌》：“好儿童，好儿童，未来世界在掌中。若非今日勤准备，将来落伍憾无穷。好儿童，好儿童，而今国难正重重。后方多尽一份力，前方将士早成功。”

## 黄炎培对绝对

刘建东

1951年冬天，郭沫若邀请朋友们在家中聚会，夏衍、黄炎培等人早早到了，过了一会田汉和南汉宸几个人才到。南汉宸抱歉地说：“因为田汉让我们去东华门外剧场看梅兰芳的《红娘》，所以迟到了。”一听此语，黄炎培灵感骤现，说：“我想到了！东华门外，南汉宸欣赏北西厢！”并跑到大厅中央兴奋地大喊大叫，惊得身边人莫名其妙。

正当众人面面相觑的时候，黄炎培娓娓道来一段故事。

原来，当年梁启超从日本回来，到好友夏曾佑（字德卿，清末民国诗人、历史学家、学者）家中探访。那时候夏还在教育部任职，梁启超进来正赶上好友办公，看到了他桌上放着厚厚的一套丛书《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梁启超随手拿起一本观看，突然说：“我这里有个上联，你能不能对出下联？我的上联是：

冬蛰庵中，夏德卿研究春秋传。”

这上联中包含的是春夏秋冬四字，却又被拆分成了不同的几个词语。梁启超说：“我这是触景生情，从刚才开始一直在脑海中，但是怎么也想不出下句。”而夏曾佑这边想了半天也没有结果，两人相视一笑，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但夏曾佑却将这个对子装在心中，遇到蔡元培、许寿裳、黄炎培等才子都拿出来一问征求答案，但是却没有任何人能对上。

冬蛰庵中，夏德卿研究春秋传；东华门外，南汉宸欣赏北西厢。梅兰芳演的《红娘》（字德卿讲的就是西厢记的故事，下联包含东西南北，还包括了南汉宸的名字，可以说对得天造地设，十分完美。

黄炎培最后感叹道：“当年夏曾佑向我询问，我一直无法对上。40多年过去了，现在灵光乍现对出下句，可是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人，却只剩下我一个了。”

##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 “文艺园丁”茅盾

王剑

茅盾热心于提携青年作家，文学大家茅盾作品丰硕，为人谦和，素有“文艺园丁”的美誉。姚雪垠出道的时候，其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受到冷遇，多次被退稿。茅盾很识时，把这篇小说发表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差半车麦秸”是旧中国千千万万农民的一个缩影。由于茅盾的力荐，姚雪垠很快受到了关注。后来，姚雪垠写出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又把书稿送给茅盾看。当时茅盾已是高龄，身体弱，视力差，但他仍坚持把书稿细读了两遍，写出35封书信，畅谈自己的审读意见。深受教益的姚雪垠多次撰文，称茅盾是他的“恩师”。

茅盾对茹志鹃的发现和推荐也堪称佳话。1958年，《延河》杂志刊登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茅盾读到这篇作品后，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用相当篇幅，颇为兴奋地分析肯定和高度赞扬了《百合花》，认为它风格上清新俊逸，

“是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最让人满意，也最使人感动的一篇”。《人民文学》刊登了茅盾的评论文章，同期还转载了茹志鹃的《百合花》。茹志鹃看到茅盾的这些评价，非常激动，觉得自己“这株已经蔫倒头的百合，又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勇气和希望”。原来，茹志鹃当时正面临人生的厄运：丈夫被打成“右派”，被开除了党籍、军籍；自己也被迫离开了部队。而茅盾及时而热情的鼓励，最终使她“立定一个主意，不管今后的道理有千难万险，也要坚持走下去”。

此外，茅盾还有力地支持了陆文夫、杜鹏程、林斤澜、玛拉沁夫、草明、马烽、胡万春等众多后起新秀的作品，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影响、艺术上的指导和创作上的扶植。有人统计过，茅盾一生点评过的中国作家有308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当时的文坛新人。

1981年，茅盾留下遗愿，将其25万元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用于奖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如今，茅盾文学奖已评选出10届，共有49位作家获此殊荣，其中70%是中青年作家。